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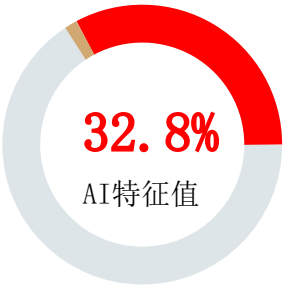
AIGC检测 · 全文报告单

NO:CNKIAIGC2026SJ_20260411686116

检测时间:2026-04-24 14:39:38

篇名：互联网诈骗中处分行为的认定研究
作者：余路路
单位：
文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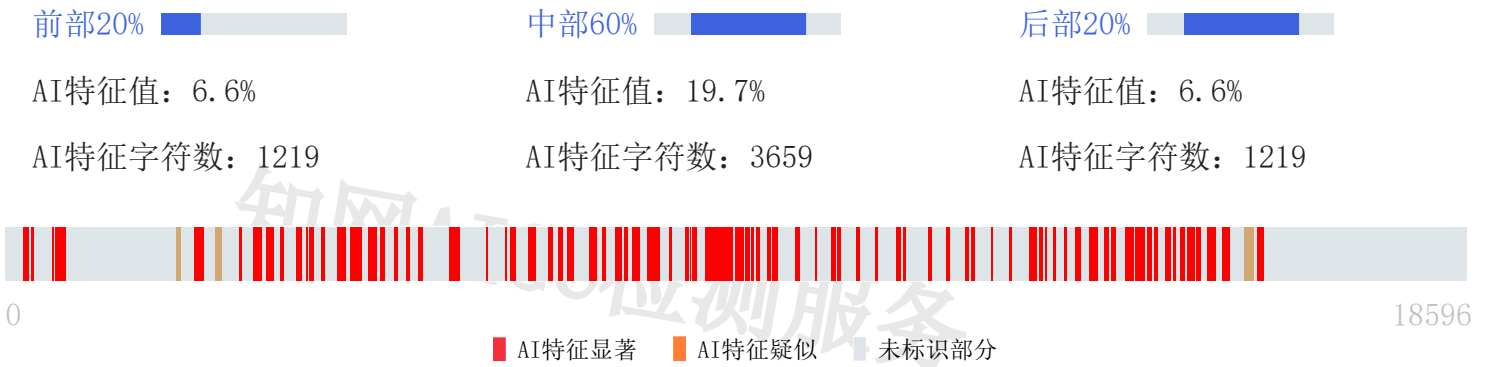
全文检测结果



AI特征值：32.8%
AI特征字符数：6099
总字符数：18596

- AI特征显著（计入AI特征字符数）
- AI特征疑似（未计入AI特征字符数）
- 未标识部分

AIGC片段分布图



分段检测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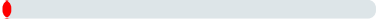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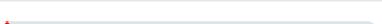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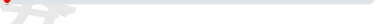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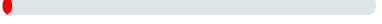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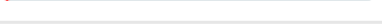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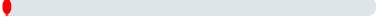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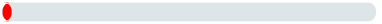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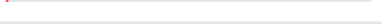

序号	AI特征值	AI特征字符数/章节(部分)字符数	章节(部分)名称
1	32.8%	6099 / 18596	论文全文






























1. 论文全文
AI特征值：32.8% AI特征字符数 / 章节(部分)字符数：6099 / 18596

片段指标列表

序号	片段名称	字符数	
1	片段1	80	0.4%

2	片段2	39		0.2%
3	片段3	27		0.1%
4	片段4	136		0.7%
5	片段5	67		0.4%
6	片段6	130		0.7%
7	片段7	92		0.5%
8	片段8	38		0.2%
9	片段9	118		0.6%
10	片段10	110		0.6%
11	片段11	56		0.3%
12	片段12	78		0.4%
13	片段13	28		0.2%
14	片段14	72		0.4%
15	片段15	60		0.3%
16	片段16	105		0.6%
17	片段17	143		0.8%
18	片段18	15		0.1%
19	片段19	62		0.3%
20	片段20	57		0.3%
21	片段21	55		0.3%
22	片段22	56		0.3%
23	片段23	54		0.3%
24	片段24	66		0.4%
25	片段25	32		0.2%
26	片段26	116		0.6%
27	片段27	38		0.2%
28	片段28	38		0.2%
29	片段29	81		0.4%
30	片段30	112		0.6%
31	片段31	59		0.3%
32	片段32	63		0.3%
33	片段33	91		0.5%
34	片段34	28		0.2%
35	片段35	79		0.4%

36	片段36	44		0.2%
37	片段37	95		0.5%
38	片段38	50		0.3%
39	片段39	55		0.3%
40	片段40	58		0.3%
41	片段41	97		0.5%
42	片段42	72		0.4%
43	片段43	39		0.2%
44	片段44	48		0.3%
45	片段45	18		0.1%
46	片段46	69		0.4%
47	片段47	38		0.2%
48	片段48	65		0.3%
49	片段49	109		0.6%
50	片段50	68		0.4%
51	片段51	24		0.1%
52	片段52	52		0.3%
53	片段53	37		0.2%
54	片段54	47		0.3%
55	片段55	46		0.2%
56	片段56	35		0.2%
57	片段57	42		0.2%
58	片段58	48		0.3%
59	片段59	50		0.3%
60	片段60	59		0.3%
61	片段61	70		0.4%
62	片段62	61		0.3%
63	片段63	36		0.2%
64	片段64	65		0.3%
65	片段65	47		0.3%
66	片段66	56		0.3%
67	片段67	40		0.2%
68	片段68	63		0.3%
69	片段69	50		0.3%

70	片段70	63		0.3%
71	片段71	48		0.3%
72	片段72	60		0.3%
73	片段73	48		0.3%
74	片段74	37		0.2%
75	片段75	44		0.2%
76	片段76	95		0.5%
77	片段77	54		0.3%
78	片段78	24		0.1%
79	片段79	41		0.2%
80	片段80	38		0.2%
81	片段81	79		0.4%
82	片段82	126		0.7%
83	片段83	73		0.4%
84	片段84	58		0.3%
85	片段85	115		0.6%
86	片段86	132		0.7%
87	片段87	69		0.4%
88	片段88	48		0.3%
89	片段89	77		0.4%
90	片段90	47		0.3%
91	片段91	70		0.4%
92	片段92	104		0.6%
93	片段93	65		0.3%
94	片段94	68		0.4%
95	片段95	40		0.2%
96	片段96	101		0.5%
97	片段97	118		0.6%
98	片段98	101		0.5%

原文内容

互联网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研究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编号：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中文）互联网诈骗中处分行为的认定研究

（英文） A Study on the Act of Disposition in the Crime of Internet Fraud

下属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 法学

班级 4241041204

学号 4241041204060

姓名 余路路

指导教师 陈学辉 职称 讲师

完成日期 2026年5月12日

诚信承诺

我谨在此承诺：本人所写的毕业论文《互联网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研究》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作了注释，若有不实，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 余路路

2026年5月12日

摘要

【摘要】笔者关注数字时代互联网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处分行为”的认定困境。作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要素，处分行为在虚拟化、非接触场景下面临主体模糊、意识虚化等挑战。为此，笔者构建了融合“事实控制力转移”客观标准与“概括性处分意识”主观基准的综合性框架：从处分行为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对处分行为进行认定，为处分行为所具有的区分机能划定范围。通过将该框架应用于二维码诈骗等典型案件分析，论证其在分清盗骗界限、统一判定尺度方面的实践有效性。笔者提出，将实体与程序融合的“刑事一体化”路径，来推动刑法理论的更新，以应对现在数字化时代的犯罪治理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诈骗；处分行为；处分意识；刑事一体化。

Abstract

【ABSTRACT】The author has found the dilemma in recognizing the core constituent element of Internet fraud crime - "disposition behavior". As the key to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aud and theft, i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ambiguous subjects and diluted intent in virtualized, contactless scenarios. So,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By identifying disposition behavior from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By applying this framework to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such as QR code fraud, as well as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ft and fraud and making adjudicative judgments, the author thinks an "integrated criminal justice" approach that needs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elements to advance the updating of criminal law,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crime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Internet Fraud; Disposition Behavior; Dis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Criminal Law

目录

TOC \o "1-3" \h \z \u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录 V

1 绪论 6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6

1.2 国内外研究情况 7

1.2.1 国内研究现状 7

1.2.2 国外研究现状 7

1.3 研究方法	8
2 互联网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处分行为理论基础	9
2.1 刑法语境下处分行为的概念	9
2.2 处分行为的体系地位与机能	9
2.3 互联网诈骗处分行为的现状	9
2.3.1 客观构造之变：“占有”与“转移”的数字化	10
2.3.2 主观构造之困：“处分意识”的稀释与证明	11
3 司法实践中互联网诈骗处分行为的认定路径分析	12
3.1 核心区分标准：以“处分意识”的有无为界分基准	12
3.2 三角诈骗的认定路径：以“处分权限”为核心	13
3.3 对“机器能否被骗”的实务立场	13
3.4 综合判断：从“单一标准”到“多因素考量”	14
4 互联网诈骗罪处分行为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14
4.1 处分意识的判断标准模糊不清	15
4.2 处分主体的认定规则存在争议	15
4.3 因果关系判断面临结构性困难	16
4.4 新型案件的定性规则供给不足	17
5 互联网诈骗罪中处分行为认定的完善	18
5.1 统一处分意识的判断标准	19
5.2 明确处分主体的认定规则	19
5.3 构建因果关系的判断框架	20
5.4 完善新型案件的定性规则	21
结语	21
参考文献	23
致谢	24
附录	25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支付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普及的时代。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社交网络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然而，技术革新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为犯罪活动提供了全新的土壤与工具。其中，互联网诈骗犯罪以其发案量巨大、手段多样迅速、涉案金额惊人、社会危害广泛，已成为当前最具威胁的财产犯罪形态之一。近年来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位运行，犯罪模式日趋专业化、链条化和跨境化，形成了从个人信息窃取、技术工具开发、诈骗脚本设计到资金转移洗白的黑灰产业链。

在这一严峻的现实背景下，刑法理论，特别是关于诈骗罪的经典教义学体系，正遭遇着自其形成以来最深切的解释危机。传统诈骗罪理论建立在一个清晰的“二人转”模型之上：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 → 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 被害人基于该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财产 → 造成财产损失。在这一逻辑关系链条中，“处分行为”居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错误认识的外在表现，更是财产损失发生的直接原因，并从根本上决定了行为是应被评价为诈骗（自我损害）还是盗窃（他人夺取）。我国刑法通说以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为代表，强调处分行为的“自愿性”及其背后的“处分意识” [1] 。

然而，互联网诈骗的典型场景颠覆了这一模型的现实前提。当一位消费者扫描被不法分子偷换的商家收款二维码进行付款时，其财产“自愿”地流入了罪犯的账户，但消费者本人却对收款主体的变更并未察觉。当一位用户点击伪装成“1元抽奖”的

链接后，其银行账户却被扣划上万元，其“处分意识”究竟指向1元还是万元？当诈骗团伙骗取被害人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后，像主人一样登录网银转账，这究竟是被被害人“处分”了财产，还是行为人“盗窃”了财产？这些每天发生的案例，使得“处分行为”的主体、主观意识、客观表现乃至其本身是否存在，都变得模糊不清。司法实践中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定性分歧与“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与法律权威。

因此，对“互联网诈骗罪中的行为处分”进行具体研究，有着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迫使我们去反思：传统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否依然有效？构成要件应如何重新解释？是否需要构建新的分析方式？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深化我们对诈骗罪本质的理解。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网络犯罪手法，司法人员需要一套可以依据参考的识别行为的理论工具或者分析框架。

1.2 国内外研究情况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许多学者对诈骗罪处分行为的研究也在不断探索中。早期研究以权威教科书体系为基础，如张明楷在《刑法学》中系统构建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体系，阐述了处分行为作为“自我损害”核心要素的地位及其区分功能，并力主“处分意识必要说” [2] 。周光权、黎宏等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强化了这一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3] 。

随着互联网诈骗问题的频繁出现，研究转向新的挑战。于志刚教授及其团队他们在《网络犯罪与安全》等著作中率先指出，网络犯罪已从“犯罪工具论”阶段进入“犯罪空间论”阶段，其产业化、链条化特征对传统刑法构成了结构性冲击 [4] 。刘宪权教授对金融诈骗的研究，则揭示了在涉众型诈骗中，被害人投机心理与认识错误交织的复杂状态，为理解网络诈骗被害人的主观世界提供了重要视角。

近年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专题化的趋势。李佩遥的专著《诈骗罪处分行为研究》对处分行为进行了系统性重述与拓展 [5] 。王钢对德国判例的引入，为我国处理“三角诈骗”等网络环境下特有的疑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比较法工具 [6] 。更为前沿的研究开始触及处分行为的“对象”本身，如赵拥军、晋涛等学者对“数据资产”、“虚拟财产”刑法属性的探讨，实质是在解决处分行为成立的前置性问题——这些新型客体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7] 。

在处分意识这一争议上，学界观点多样。除坚持传统“必要说”与“不要说”的学者外，“缓和说”（或称“概括意识说”）获得了较多支持，主张只要对财产转移有概括认识。还有学者尝试引入“客观归责理论”，将分析重点从被害人主观心态转向行为人创设的风险。

1.2.2 国外研究现状

此外，国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的知识资源。

在传统大陆法系，德国刑法理论以其高度精密性著称，对我国影响深远。德国通说强调处分行为的“直接性要件”，即财产减损必须直接由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导致。其对“认识错误”的精细分类——尤其是“动机错误”与“行为（内容）错误”的区分，为分析网络诈骗中被害人“为何而处分”以及“以为自己在处分什么”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英美法系及犯罪学的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的范式。例如，学者Korsell对21世纪欺诈犯罪趋势的分析具有宏观洞察力 [8] 。Graves和Acquisti对计算机犯罪量刑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此类犯罪类比为“欺诈罪”进行量刑，这从后果角度印证了网络不法行为与欺诈内核的亲近性 [9] 。犯罪学手册类著作，如Don Hummer等主编的《犯罪与技术手册》，系统阐述了技术如何为各类犯罪创造机会、塑造模式 [10] 。

跨学科视角的引入。例如，学者Nataraj-Hansen对在线诈骗中“责备层级”的研究，揭示了社会舆论乃至司法潜意识中对不同被害人（如投资诈骗受害人与情感诈骗受害人）存在的归责偏见，值得反思下刑法评价的客观性。对网络诈骗的理解，我们不能通过单一的刑法规范去分析，要融合犯罪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知识 [11] 。

综上所述，通过国内外研究的分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一些反思：一是对网络诈骗进行精细化类型区分，构建处分行为认定规则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如何将跨学科知识有效融入，形成更具系统的综合框架；三是对中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显著的案例（比如“薅羊毛”），还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回应与规则制定。

1.3 研究方法

笔者综合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 分析法
2. 比较法
3. 案例法
4. 整合法

2 互联网诈骗中构成要件的处分行为理论基础

2.1 刑法语境下处分行为的概念

处分行为”并非刑法独有的概念，其在民法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明确这二者间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是准确理解刑法中处分行为含义的起点。

民法中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相对，是指直接使既有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行为，如动产交付、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其核心在于基于意思自治，引发权利归属在法律上的终局性变动。民法关注的是法律关系的稳定与交易安全。

刑法中的处分行为，则特指诈骗罪构成要件中，受骗者基于错误认识而实施的、导致自身财产占有或控制力直接转移的行为。其重心不在于权利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在于财产事实控制状态基于瑕疵意思而发生的即时改变，以及这一改变与欺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例如，被害人因受骗将财物交给骗子，即便该交付在民法上因欺诈而可撤销，刑法上的处分行为已然成立，犯罪可能已既遂。

总之，民法处分规范“权利的流动”，重在法律效果；而刑法处分则评价“导致法益侵害的行为”，重在行为实质与因果归责。网络环境中，网络上的一次点击可能同时触发民事上的支付授权（负担行为）与刑法上的财产处分，但刑法必须独立判断这次点击是否是在被欺诈状态下作出的、导致财产失控的关键行为。

2.2 处分行为的体系地位与机能

作为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核心要素，处分行为不仅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动作，更是在犯罪构造中起到特定规范功能的关键点。其存在的意义远超行为本身，主要体现在对因果流程的归责确认、对不同罪名的界分标尺以及对刑罚范围的合理限定这三个维度。

2.3 互联网诈骗中处分行为的现状

2.3.1 理论现状分析：学说的争论与演进

互联网诈骗场景下，处分行为理论的核心争议集中于处分意识必要性与行为构造适配性两个部分，表现出传统教义学与网络新形态相互间的演进趋势。学界围绕处分意识形成必要说、不要说、缓和修正说三足鼎立格局：必要说坚守诈骗罪“自愿处分”本质，强调主观认知是界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不要说侧重客观财产转移，主张淡化意识要素以应对线上非面对面交易；缓和处分意识说为通说，认可概括性、整体性处分认知即可成立处分行为。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盗骗交织案件增多，传统二人结构理论逐步向三角诈骗、新型三角诈骗、拟制处分拓展，聚焦处分权人、被骗人、被害人分离场景下的认定规则。总体来看，理论演进从纯粹概念辨析转向实务导向的教义学调适，致力于为二维码替换、虚假链接、刷单诈骗等典型网络案件提供统一、可操作的判断标准，推动处分行为理论从传统财产犯罪框架向数字化场景现代化转型。

2.3.2 处分意识必要说下的理论尝试

坚持处分意识必要性的学者，致力于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来适应新环境。

缓和说（概括意识说）：该说主张，处分意识虽为诈骗罪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其内容可大幅放宽——不要求被害人对处分财产的具体对象、精确数量或实际价值有明确认识，只需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财产发生转移”这一基础事实具有最概括、笼统的认识即可。换言之，只要被害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可能付钱”或“可能转移财产”的行为，即便对具体细节存在误解，仍可认定其具备处分意识 [12]。这一学说的代表性学者包括张明楷教授，其明确指出“受骗者处分财产时必须具有处分意识，即认识到自己将某种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但不要求对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 [13]；李佩遥博士在其专著《诈骗罪处分行为研究》中亦对“缓和的处分意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主张采取“有限度的极端缓和说” [14]；此外，邹兵建教授提出的“覆盖范围说”也属于对处分意识程度要求的缓和化解释路径。缓和说为认定点击链接、扫码支付等网络交互行为仍具备处分意识提供了理论可能，成为当前应对网络诈骗挑战的主流修正路径。

客观归责理论：以劳东燕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尝试引入客观归责理论作为补充分析工具。 客观归责理论是源自德国刑法学的重要理论，旨在解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归责问题。该理论主张，在确认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后，还需进一步从规范层面判断该结果是否可归责于行为人。周光权教授系统阐述了该理论在财产犯罪中的适用，指出其本质是一种规范判断，具有限制犯罪成立范围的重要功能。陈毅坚副教授则进一步将客观归责理论运用于诈骗罪研究，讨论了欺诈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归责关联。

2.3.3 处分意识不要说及其替代理论

部分学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坚持处分意识必要性已不现实，主张转向更客观的标准。

2.3.1 客观构造之变：“占有”与“转移”的数字化

传统“占有”指对有形物的物理支配。而在网络空间，“占有”体现为对数字财产（如电子货币、虚拟物品）的排他性控制权限，这种权限由密码、私钥、生物特征等认证手段所维系。因此，“占有转移”的本质是控制权限的让渡。例如，告知他人网银密码，即意味着将账户内资金的占有转移给了对方。在第三方支付中，当用户发出不可撤销的支付指令并通过验证时，即丧失了对该笔资金的事实控制力，占有发生转移，无论平台是否已完成银行间的清算。

2.3.2 主观构造之困：“处分意识”的稀释与证明

“处分意识”即被害人对财产转移行为的认知。网络诈骗通过两种方式严重稀释了处分意识：一是界面欺诈，如将大额支付按钮伪装成“确认”或“抽奖”，使被害人行为与认知分离；二是流程自动化，如免密支付，使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在时间上分离。这导致传统的“具体认知说”难以为继，“概括认知说”（即只需认识到行为可能导致财产变动）成为更务实的选择。同时，证明被害人的主观心态不能依赖口供，而需依靠电子证据（如界面截图、操作日志）进行“情境综合推定”，即根据当时的客观信息环境推断其应有的认知状态。

3 司法实践中互联网诈骗处分行为的认定路径分析

司法实践中，面对互联网诈骗中“盗骗交织”的复杂形态，各级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定思路与裁判规则。本章旨在梳理当前实务中的通行做法，揭示其内在逻辑与操作要点，为后续问题分析奠定基础。

3.1 核心区分标准：以“处分意识”的有无为界分基准

通过对大量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核心标准，始终围绕“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这一关键命题展开。尽管网络诈骗场景复杂多变，但各级法院普遍将处分意识的有无作为定性分析的逻辑起点。

（一）处分意识认定的基本立场

从整体趋势来看，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纳“缓和的处分意识说”，即不要求被害人对财产转移的具体细节（如精确金额、最终收款方）有完整认知，只要求其对“自己的行为正在导致财产付出”具有基本认识。这一立场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7号（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案裁判要点明确指出：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自愿”处分财物，以及该处分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在“虚假链接”场景中，若被害人点击链接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支付款项，则缺乏处分意识，应认定为盗窃；若被害人知道自己在付款仅对金额有误解，则仍可能构成诈骗。

（二）处分意识认定的具体操作

实践中，法官通常从以下几个维度综合判断处分意识是否存在：

第一，审查操作行为的性质。被害人实施的是“支付操作”还是“一般点击”？如果界面明确显示支付金额、收款方等信息，被害人在此基础上点击确认，通常认定具有处分意识。反之，若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将支付按钮伪装成“抽奖”、“查询”等无关功能，被害人对其行为的财产处分性质毫无认知，则应认定处分意识缺失。

第二，审查错误认识的类型。借鉴德国刑法理论，司法实践逐渐区分“动机错误”与“行为错误”。动机错误（如以为投资能赚钱而转账）不影响处分意识的成立；行为错误（如以为在抽奖实为付款）则可能阻却处分意识。这一区分在“虚假投资平台”案件中尤为常见——被害人明知自己在转账，只是对投资回报存在错误期待，法院普遍认定诈骗罪成立。

第三，审查信息环境的透明程度。行为人是否刻意隐藏或扭曲关键信息？若界面设计存在明显欺诈性（如将巨额扣款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法官倾向于认定被害人无法形成真实的处分意识，从而否定诈骗罪的成立。

3.2 三角诈骗的认定路径：以“处分权限”为核心

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普及，诈骗行为呈现出“行为人-被骗人（平台/顾客）-被害人（商户）”的三角结构。对此，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了以“处分权限”为核心的认定路径。

（一）“偷换二维码”案件的裁判分歧与主流观点

“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案件是三角诈骗认定的典型场景。通过对各地裁判文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实践中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诈骗罪立场（以浙江、上海部分法院为代表）：认为顾客扫描二维码支付的行为，是基于对二维码真实性的信赖而实施的财产处分。顾客对收款方身份存在错误认识，该错误直接导致其将资金支付给了行为人而非商户，商户虽未直接处分财产，但因顾客的错误处分而遭受损失，符合三角诈骗的构造。

盗窃罪立场（以江苏、广东部分法院为代表）：认为顾客支付行为并无瑕疵，其对“向商家付款”具有正确认识；真正受损的是商户的应收债权，该债权被行为人以秘密置换二维码的方式窃取，顾客仅是被利用的工具。

从近年来的裁判趋势看，诈骗罪立场逐渐获得更多支持。理由在于：三角诈骗的核心特征是被骗人与被害人并非同一人，但被骗人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在扫码支付场景中，顾客处分的虽是自己的资金，但该处分的目的是向商户支付货款，商户对顾客的付款享有债权。行为人通过欺骗顾客（使其将款项支付至错误账户），间接侵害了商户的债权，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

（二）“骗取权限后转账”案件的认定逻辑

行为人骗取被害人账户密码、验证码后自行登录转账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分歧。主流观点倾向于认定为盗窃罪，理由是被害人交出权限信息时，并未直接处分财产——财产转移的关键环节是行为人后续的“登录+转账”操作，该操作违反被害人意志，属于秘密窃取。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若被害人交出的信息足以使行为人完全控制账户（如同时交付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则可视为财产控制权的转移，构成诈骗。

3.3 对“机器能否被骗”的实务立场

“机器能否被骗”是互联网诈骗定性中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影响“薅羊毛”等利用系统漏洞案件的罪名适用。司法实践对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立场。

（一）传统立场：坚持“机器不能被骗”

绝大多数判决坚持“机器不能被骗”的传统立场。理由在于：诈骗罪的核心是“欺骗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处分财产”。机器（包括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基于预设程序和算法，其输出结果是对输入条件的机械响应，不存在“认识”更遑论“错误认识”。因此，针对机器系统的操作，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意义上的“欺骗”。

（二）实务中的例外与变通

尽管坚持“机器不能被骗”的原则，但司法实践在具体案件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区分“机器”与“背后的人”：若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欺骗的是系统背后的人工审核环节（如伪造身份信息通过人工审核），则仍可认定为诈骗罪。

区分“系统错误”与“主动欺骗”：若行为人仅被动利用系统既有的漏洞（如价格设置错误、程序BUG），不构成诈骗；若行为人主动输入虚假数据、篡改系统参数，使系统作出有利于己的错误响应，部分法院倾向于认定为诈骗罪或计算机犯罪。

以计算机犯罪作为补充：在难以认定为诈骗罪的情形下，法院常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兜底，以实现罪刑均衡。

3.4 综合判断：从“单一标准”到“多因素考量”

通过对上述认定路径的梳理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已逐渐摆脱单一标准的机械适用，转向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判断模式。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通常综合评估以下要素：

1. 行为人的欺骗手段：是主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还是仅被动利用既有漏洞？
2. 被害人的认知状态：被害人是否知道自己正在处分财产？错误认识的性质是动机错误还是行为错误？

3. 财产转移的关键环节：财产损失是由被害人的操作直接导致，还是由行为人后续的独立行为导致？

4. 技术环境的透明度：行为人是否通过界面设计刻意隐瞒或扭曲关键信息？

5. 平台或系统的角色：第三方平台是被动执行者，还是具有一定独立判断能力的处分主体？

这种综合判断模式，既体现了司法实践对理论争议的务实回应，也为后续识别认定中的问题提供了分析基础。

4 互联网诈骗中处分行为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司法实践认定路径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互联网诈骗罪处分行为的认定在多个维度上存在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既源于传统刑法理论在网络场景下的适用失灵，也反映出现行裁判规则在应对新型犯罪形态时的不足。本章将这些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4.1 处分意识的判断标准模糊不清

传统处分意识作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核心要素，其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一）“概括认识”的底线把握不一

虽然理论界普遍采纳“缓和说”，认为被害人只需对财产转移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但在具体司法适用中，不同法院对“概括认识”的底线把握存在显著差异。有的法院要求被害人对支付金额具有大致认识，若实际扣款金额与被害人认知的金额差距过大（如以为支付1元实为支付万元），则否定处分意识的存在，转而认定为盗窃罪；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要被害人知道自己“在付钱”，即使对金额完全没有概念，也不影响处分意识的成立。这种尺度差异导致“虚假链接”类案件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样是“1元链接实扣万元”的案件，部分地区法院认定为盗窃，另一部分地区法院认定为诈骗。

（二）“动机错误”与“行为错误”的区分缺乏可操作性

德国刑法理论中对“动机错误”与“行为错误”的区分，为判断处分意识提供了重要工具，但这一区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以“虚假投资平台”案件为例：被害人明知自己在转账，但对“平台是否真实”存在错误认识——这究竟是动机错误（以为能赚钱而投资）还是行为错误（以为在向正规平台付款）？两种解释在理论上似乎都有道理，但直接导致不同的定性结论。若认定为动机错误，则诈骗罪成立；若认定为行为错误，则可能否定处分意识。实践中，法官往往依赖直觉判断，缺乏统一的区分标准。

（三）处分意识的证明路径单一且困难

处分意识作为主观心理状态，在网络非接触式交易中难以通过直接证据加以证明。被害人往往无法清晰回忆当时的心理状态，行为人也难以提供反证。实践中，法官只能通过界面设计、操作流程、提示信息等客观证据“推定”被害人的主观状态，但这种推定缺乏统一的证明标准。什么样的界面设计足以否定处分意识？什么样的操作流程足以认定处分意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高度依赖法官的个人判断，导致推定结果不稳定。

4.2 处分主体的认定规则存在争议

在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多环节操作或多人参与的网络诈骗中，“谁是被骗人”、“谁是处分人”往往难以确定，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

（一）三角诈骗中处分权限的认定缺乏标准

“偷换二维码”案件的定性争议——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其根源在于对处分主体及处分权限的不同理解。持诈骗罪立场者认为，顾客是处分人，其处分了自己的资金，且具有处分权限；持盗窃罪立场者认为，商户是被害人，顾客只是被利用的工具，其对商户应收债权的处分缺乏权限依据。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难以完全自洽。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三角诈骗结构中，被骗人（顾客）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商户）财产的权限？现行理论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导致法官在个案中只能自行选择立场。

（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在涉及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案件中，平台究竟是“被动执行工具”还是“具有独立处分权限的主体”，直接影响处分行为的认定。若平台仅是执行用户指令的工具，则处分主体仍为用户，平台的行为可归属于用户；若平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如风险

审核、交易拦截），且其判断被行为人欺骗，则平台本身可能成为诈骗罪中的“被骗人”。然而，现行法律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刑法中的定位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法院将平台视为“电子代理人”，有的法院将其视为“独立的处分主体”，裁判标准不统一。

（三）“机器能否被骗”的立场长期分裂

“机器能否被骗”是互联网诈骗定性中的基础性问题，但司法实践对此长期存在分裂立场。坚持传统立场的法院认为，机器不能被骗，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产生“错误认识”，因此针对机器系统的操作不构成诈骗罪意义上的“欺骗”。持灵活立场的法院则认为，当自动化系统具备一定的识别与判断功能时，对其输入虚假数据使其作出错误响应，在刑法评价上可类比为欺骗，应认定为诈骗。这一分裂在“薅羊毛”类利用系统漏洞获取优惠的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一性质的行为，有的法院认定为诈骗，有的认定为盗窃，有的认定为计算机犯罪，判决结果高度不一致。

4.3 因果关系判断面临结构性困难

网络诈骗的链条化、技术化特征，使得欺骗行为、处分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趋于复杂，传统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应对。

（一）技术环节介入导致因果链条间接化

在传统诈骗中，欺骗行为与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直接——行为人欺骗，被害人信以为真并立即处分财产。但在网络诈骗中，二者之间往往介入了复杂的技术环节：被害人点击链接后，可能经过多次页面跳转、系统验证、平台审核等环节，最终才完成财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的“处分意识”是否贯穿始终？技术环节的介入是否中断了欺骗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例如，在“虚假链接”案件中，被害人点击链接后，资金并非直接转出，而是经过支付平台的身份验证、银行的风控审核等多道程序，最终才完成划转。此时，究竟是点击行为还是后续的系统验证环节“造成”了财产损失？不同回答可能导致不同的归责结论。

（二）第三方平台的介入模糊了归责边界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介入，使得财产转移的因果链条进一步复杂化。当用户发出支付指令后，平台会进行身份验证、余额检查、风险审核等操作。若平台在这些环节中出现系统错误或审核疏漏，导致本应被拦截的交易成功执行，该损失能否归责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若平台发现异常并发出风险提示，但用户忽略提示继续操作，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现行理论框架下，这些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实践中，法官往往回避对因果关系的深入分析，直接依据处分行为的有无进行定性，导致归责判断流于表面。

（三）被害人过错对归责的影响缺乏规范评价

在网络诈骗中，被害人往往存在一定过错——轻信虚假信息、未仔细核对支付界面、疏忽大意泄露验证码等。这种过错是否影响对行为人的归责？理论上存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但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缺乏统一规则。有的法院认为被害人过错不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成立，仅可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有的法院则将被害人重大过错作为否定诈骗罪成立的理由之一，认为损失应部分归责于被害人自身。这种不一致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个案公正，也损害了法律的统一适用。

4.4 新型案件的定性规则供给不足

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现有理论框架和裁判规则难以完全覆盖，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定性疑难案件。

（一）“薅羊毛”案件的罪名竞合与适用困境

“薅羊毛”案件涉及诈骗、盗窃、计算机犯罪等多个罪名的争议，其核心难题在于：平台系统能否被“骗”？若坚持“机器不能被骗”的传统立场，则大量利用系统漏洞获取财产的行为无法以诈骗罪论处；但若完全否定诈骗罪的适用，又可能导致罪刑失衡——利用系统漏洞获取巨额财产的行为，若仅以计算机犯罪定罪，其法定刑往往低于诈骗罪，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各异，有的认定为诈骗罪，有的认定为盗窃罪，有的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裁判规则极不统一。

（二）AI诈骗等新形态的规制空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换脸、语音合成、深度伪造等技术被用于诈骗活动。在这些场景中，“被骗人”可能是经过AI处理的虚假影像或声音，被害人基于对“熟人”的信任处分财产。此时，欺骗行为的对象是谁？是被害人本人（其对“对方身份”产生错误认识），还是AI生成的内容（其本身是否构成“欺骗工具”）？处分行为如何认定？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理论的解释范围。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尚未对AI诈骗作出专门规定，导致此类案件的定性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三）跨境、跨平台诈骗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难题

互联网诈骗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个网络平台，行为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电子证据分布广。在这种复杂场景中，处分行为的“发生地”难以确定，犯罪结果“发生地”也可能涉及多个法域。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对同一行为的定性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案件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均面临困难。例如，行为人在境外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在境内处分财产，资金经多个境外账户流转后最终被提取——处分行为发生在境内还是境外？应适用哪国法律？这些问题虽超出刑法教义学的范畴，但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不容忽视，亟待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5 互联网诈骗中处分行为认定的完善

针对所揭示的处分意识判断标准模糊、处分主体认定存争议、因果关系判断陷困境以及新型案件定性规则供给不足等四大问题，本章旨在构建与之对应的体系化认定规则，以期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破解理论适用难题。客观层面认定规则的完善。

5.1 统一处分意识的判断标准

为解决处分意识判断标准模糊的问题，应从认定标准的确立、错误类型的区分以及证明方法的完善三个层面进行规则构建。

（一）确立“概括性处分意识”的统一认定标准

应明确采纳“概括性处分意识”作为统一的认定标准。所谓概括性处分意识，指被害人对其行为可能导致财产变动具有最基本的、笼统的认识，不要求其对处分对象、数量、价值等具体细节有明确认知。具体而言，需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行为认知条件：被害人认识到自己正在实施一个“可能引致财产付出或转移”的行为。这一认知不要求精确，但必须与其实施的操作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例如，点击“支付”、“确认”、“购买”等按钮时，只要被害人认识到该操作可能导致资金付出，即使对具体金额存在错误认识，仍可认定具备概括处分意识。

第二，信息环境条件：行为人未通过技术手段完全排除被害人形成上述认知的可能性。若行为人将支付按钮伪装成“抽奖”、“查询”等无关功能，或通过界面设计刻意隐藏关键信息，使一般理性人无法认识到行为的财产处分性质，则应认定被害人根本不具备任何形式的处分意识。

（二）建立错误类型的区分规则

应建立以“错误对象”为核心的错误类型区分规则。动机错误（对“为何处分”产生错误）不影响处分意识成立；行为错误（对“行为性质”产生根本误解）则阻却处分意识成立。在具体判断中，法官应重点审查行为人的界面设计、操作流程、提示信息等客观证据，以“一般理性人标准”判断被害人应当形成何种认知，而非单纯依赖被害人事后陈述。

（三）完善以“情境推定”为核心的证明方法

应构建以“情境推定”为核心的证明方法。通过全面收集操作界面截图、支付流程录屏、系统日志、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重建被害人决策时的完整信息环境，以一般理性人标准判断在该环境下是否能够形成处分意识，并结合被害人年龄、教育背景、网络使用经验等个体特征进行校正。这一证明方法将主观要件的证明转化为对客观情境证据的分析判断，既降低了证明难度，又保证了认定的客观性。

5.2 明确处分主体的认定规则

针对处分主体认定存在争议的问题，应以“处分权限”为核心，从三角诈骗的认定、第三方平台的法律定位以及“机器能否被骗”的立场统一三个方面进行规则构建。

（一）以“处分权限”为核心的处分主体认定规则

在三角诈骗结构中，处分主体的认定关键在于“处分权限”的判断。处分权限可以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事先授权或社会一般观念。在三角诈骗中，被骗人与处分人可以是不同主体，但处分人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若被骗人具有处分权限且基于错误认识实施了处分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若不具有处分权限，则应考虑盗窃罪等其他罪名的适用。

（二）明确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定位

应根据平台的实际功能区分三种情形：平台作为“被动执行工具”时，其行为归属于用户，处分主体为发出指令的用户；平台作为“独立处分主体”时，其本身可能成为“被骗人”或“处分人”；平台作为“共同处分主体”时，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分配责任。

（三）统一“机器能否被骗”的司法立场

应在坚持“机器不能被骗”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变通：若欺骗对象实质上是系统背后的人工审核环节，可考虑诈骗罪的适用；对于利用系统漏洞的行为，若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应优先考虑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计算机犯罪罪名的适用，以实现罪刑均衡。

5.3 构建因果关系的判断框架

针对因果关系判断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应引入客观归责理论，并从因果链条的审查、平台介入的影响评估以及被害人过错的归责考量三个方面进行规则构建。

（一）建立“风险实现”为核心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

应引入客观归责理论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补充工具，将分析焦点从经验性的因果流程转向规范性的归责评价。具体判断步骤为：审查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财产风险；审查该风险是否在财产损失中得以实现；审查将损失归责于行为人是否具有规范上的合理性。

（二）明确平台介入对因果关系的影响规则

应明确：平台正常执行指令时不中断因果关系；平台独立判断失误可能中断因果关系，该部分损失不应归责于行为人；平台与行为人共同过错时，应根据原因力大小分配责任。

（三）确立被害人过错的归责考量规则

应确立：被害人一般过失不影响归责；被害人重大过失可减轻归责；被害人故意或与有恶意则不适用归责。这一规则既坚持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适度体现了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原则。

5.4 完善新型案件的定性规则

针对新型案件定性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应从“薅羊毛”案件的类型化处理、AI诈骗等新形态的规则探索以及跨境案件的管辖权协调三个方面进行规则构建。

（一）“薅羊毛”案件的类型化处理规则

应根据行为类型分别处理：单纯利用系统漏洞型，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应优先考虑计算机犯罪；虚构事实欺骗人工审核型，符合传统诈骗罪构造，应以诈骗罪论处；技术手段欺骗系统验证型，在现行法框架下应优先考虑计算机犯罪。

（二）AI诈骗等新形态的规则探索

应在现有理论框架内进行适度拓展：AI技术仅是工具，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关键在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是否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同时，应关注技术滥用的独立评价，若行为人同时构成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侵犯肖像权等违法行为，应依法另行评价。

（三）跨境、跨平台案件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协调

应以“行为结果发生地”为主要管辖依据，通过司法协作机制协调定性标准，并建立高效的跨境电子证据调取机制，为案件事实认定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

结语

互联网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研究，是一场传统刑法智慧与数字时代犯罪新形态的持续对话。笔者进行了对司法实践中认定路径的梳理，阐述了存在问题的剖析以及完善建议的构建，也展现了通过教义学调适与跨学科相互融合，以找到解决这些挑战的可能路径。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已形成以“处分意识”为核心、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认定思路，但在具体适用中仍面临处分意识判断标准模糊、处分主体认定存争议、因果关系判断陷困境以及新型案件定性规则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笔者的主要结论

在于：第一，明确提出了“概括性处分意识”的统一认定标准，将其底线界定为对“可能引致财产变动”的概括认知；第二，构建了以“处分权限”为核心的处分主体认定规则，区分了三角诈骗中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第三，引入了客观归责理论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补充工具，形成了“风险创设—风险实现—规范归责”的三步检验框架；第四，对“薅羊毛”、AI诈骗等新型案件提出了类型化的处理规则。

笔者认为，对互联网诈骗罪的研究需要更深入的“刑事一体化”。这不仅要求刑法教义学内部发展出更精细的类型化规则，更要求我们在证据法层面推动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与证明方法的革新，在犯罪治理层面能够构建起前端预防、中端阻断与后端惩戒的全链条体系。法律人需要与技术专家、平台企业、社会治理者展开更紧密的对话与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刑事法治理也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不断推动刑法理论与时俱进，这不仅要求刑法教义学内部发展出更精细的类型化规则，更要求我们在证据法层面推动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在犯罪治理层面构建防控体系。这样我们才能在变幻莫测的网络犯罪中，牢牢把握住我们正义的方向盘，守护好我们的财产安全与社会的公平正义。针对处分行为认定的完善，笔者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篇幅和理论功底受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请谅解。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 刑法学（第六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2] 周光权. 刑法各论（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3] 于志刚. 网络犯罪与安全[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

[4] 李佩遥. 诈骗罪处分行为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

[5] 王钢. 德国判例刑法分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6] 劳东燕. 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7] 车浩. 刑法公理与判例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

[8] 刘宪权. 金融犯罪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9] 赵拥军. 论财产犯罪中数据资产的占有及转移[J]. 法学研究，2023(2).

[10] 晋涛，姚晶晶. 论虚拟财产在刑法中的认定规则[J]. 中国法学，2023(4).

[11] Grabosky, P., & Smith, R. Crime in the Digital Age: Controll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yberspace Illegalities[M]. Routledge, 2018.

[12] Hummer, D., & Byrne, J. M. Handbook on crime and technology[M]. Springer, 2023.

[13] Graves, J. T., & Acquisti, 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ntencing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computer crimes[J].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23, 20(2).

[14] Nataraj-Hansen, S. "More intelligent, less emotive and more greedy": hierarchies of blame in online fraud[J].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2024.

[15]Korsell L: Frau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20.

[16]Don Hummer, James M. Byrne, Handbook on crime and technology,2023.

致谢

由衷地感谢导师在本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悉心指导与多次的宝贵意见，从选题立意、框架构建到字句等细节的多次批注修改，都花费了老师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对学生的无私关怀，令我深深感动。同时，感谢法学院老师教授的专业知识，让我学到了专业的法学理论基础，也感谢教务老师不厌其烦地进度提醒，帮助我按时完成任务。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如一的理解、支持与鼓励，是我完成学业，不断提升自我，探索前行的最大助力。是你们背后的托举，让我完成这段美好的持续学习旅程。学无止境，我会带着这份难忘的经历继续不断向前。

附录

无

- ¹ 张明楷. 刑法学（第六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000-1005.
- ² 张明楷. 刑法学（第六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000-1005.
- ³ 周光权. 刑法各论（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300-305.
- ⁴ 于志刚. 网络犯罪与安全[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1-10.
- ⁵ 李佩遥. 诈骗罪处分行行为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1-15.
- ⁶ 王钢. 德国判例刑法分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200-220
- ⁷ 赵拥军. 论财产犯罪中数据资产的占有及转移[J]. 法学研究，2023(2).45-60
- ⁸ Korsell L. Frau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2020, 26(3):
- ⁹ Graves J T, Acquisti 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ntencing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computer crimes[J].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023, 20(2): 434-471 .
- ¹⁰ Hummer D, Byrne J M, eds. Handbook on crime and technology[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 17-37
- ¹¹ Nataraj-Hansen S. "More intelligent, less emotive and more greedy": hierarchies of blame in online frau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Crime and Justice, 2024, 76: 100652, 1-12 .
- ¹² 邹兵建. 诈骗罪中处分行行为的体系位置与内容构成[J]. 政治与法律，2022(4).
- ¹³ 张明楷. 刑法学（第六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003.
- ¹⁴ 李佩遥. 诈骗罪处分行行为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

说明：

- 1、支持中、英文内容检测；
- 2、AI特征值=AI特征字符数/总字符数；
- 3、红色代表AI特征显著部分，计入AI特征字符数；
- 4、棕色代表AI特征疑似部分，未计入AI特征字符数；
- 5、检测结果仅供参考，最终判定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时，需结合人工复核、机构审查以及具体学术政策的综合应用进行审慎判断。



关注微信公众号